

# 两汉时期谱牒学概论

仓修良

**摘要：**两汉时期的谱牒学在谱学发展史上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原因在于这些学者认为只有私家之家谱、族谱才算是谱学著作。本文认为论述家族姓氏起源及发展的论著和论述帝王世系的史表同样是谱学著作。因此，《史记》等史书中的各类史表，以及王符、应劭等人专门论述姓氏的诸多论著便一同构成了两汉时期谱牒学的重要内容，且相当丰富多彩。

**关键词：**谱牒学；族谱；家谱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8)01-0001-06

## 一、两汉谱牒学简介

秦朝建立的时期比较短暂，既未留下象样的历史著作，更未留下谱牒方面的资料。汉代情况则有所不同，尽管真正意义上的私家之谱尚未见，但是记载帝王、诸侯的谱牒著作则确实存在，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帝王诸侯世谱》20卷、《古来帝王年谱》5卷。很多学者已指出，这里的“世谱”、“年谱”就是指“世表”、“年表”，这类书籍就是记载帝王、诸侯世系，是由宗正官们所编辑。汉承秦制，置宗正掌管王室之宗亲<sup>①</sup>，实际上宗正官有两大任务，一是管理属籍，汉代分封在各地的诸王，每年要把宗室的名册上报给宗正，宗正根据这些名册编纂成皇室谱牒，并形成诸王世谱；二是序列宗室各成员与皇帝的嫡庶远近关系，确立诸侯后代与诸侯王的亲疏关系，以便确立诸侯王的继承关系，当然对于这些诸侯王建立谱牒资料就更为重要。制度虽然有如此明确的规定，但是记载似乎并不是那么认真详细，所以司马迁在寻找、利用这些诸侯王谱牒资料时，就深深感叹地说：“汉

兴以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强弱之原。”<sup>②</sup>其实这种情况并非汉代如此，晋时期的帝王谱牒也同样不齐全。《晋书·职官志》载“宗正统皇族宗人图牒”，而曾两任宗正卿的虞泽就曾讲过：“太宁二年（324），臣忝宗正，帝谱泯弃，罔所循按。时博谕旧齿，以定昭穆，与故骠骑将军华恒、尚书荀崧、侍中荀邃因旧谱参论撰次，尊号之重，一无改替。”<sup>③</sup>这条材料说明虽有宗正官职，但王室谱牒的记载也未必完成，而关键时刻旧谱又起着决定性的无可替代作用。可见宗正在编辑皇室谱牒方面或有不甚尽职，因而造成谱牒的残缺不全。但尽职者还是有的，因而才有可能留下《帝王诸侯世谱》20卷。

若说汉代私家之谱尚未出现，有人肯定会用《扬子家牒》来反驳。其实《扬子家牒》只是一个家传，并非我们所讲的真正意义上的家谱。对此，前人已有定论，潘光旦先生1929年在《中国家谱学略史》一文中已指出：

《扬氏家牒》散亡亦早，刘歆《七略》最先引之，后世因知子云以甘露二年生。唐时《艺文类聚》礼部犹得转录引其文曰：‘子云以天凤五年卒，弟子侯芭负土作坟号曰元’。又曰：‘云卒，桓君山为敛赙起祠’。刘知几《史通》言家史范围，亦尝引列之。惟家牒一书，实质兼谱传，且恐泰半为家传，故章宗源考证隋代经籍，

<sup>①</sup>《汉书·高祖本纪》载：八年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更加清楚：“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注曰：“胡广曰：‘又一岁治诸王世谱差序秩第。’”

收稿日期：2008-09-10

作者简介：仓修良（1933—），江苏泗阳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方志学。

<sup>②</sup>《史记·太史公自序》。

<sup>③</sup>《晋书·后妃传上》。

以之入杂传而不入谱牒。质诸《汉书》扬雄本传，亦谓：‘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则可知扬氏当时实少可为谱之资料。章氏或有见及此也。<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刘知几已将《扬氏家牒》的性质定为叙传，其文曰：

屈原《离骚经》……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仿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

……历观扬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 尚为宗。<sup>②</sup>

非常明显，刘知几是将扬雄《家牒》看作是叙传一类，其作为史学评论家专门评论各类史书的性质，所说自属可靠，何况他对家谱亦深有研究，上述结论，决非随意所谈。所以我们说在汉代真正意义上的私家之谱还未产生。

潘光旦先生将私家之谱称为“平民之谱学”，他也认为“汉代平民谱学不重”。那么汉人为什么不重谱学呢？潘先生认为“有一大原因焉，曰大族之迁徙频繁。”文章列举了“前后官办之移民运动凡十七次，其中所移为豪富大族者凡六次”，因而文章结论说：

吾人之心理，久于其地则爱其地；久与其宗族相属，则敬宗收族之谊油然而生；而谱牒一类文字事业自应运而出。今移徙频繁；既夺其祖宗所世守之郡邑，又离其所久与周旋之宗族，则情谊既杀，而为谱之动机于焉锐减。……孙星衍序《校补元和姓纂辑本》有曰：‘姓氏与郡望相属，乃知宗派所出。……三代以上，官有世禄，各居其国都。自汉时徙豪右入关，而郡望非其土著，’盖亦解释汉代谱学所以不振之言也。<sup>③</sup>

确如潘先生所说，汉人不重谱学，尤其不重私家之谱的编修。潘先生认为其不重视的最大原因是“大族之迁徙频繁”，此也未必是真正的原因。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须有产生这种文体的社会条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适合产生这种文体的土壤和温床。众所周知，“郡望”这一社会现象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当时由于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形成了门阀制度，这些豪族亦称望族每个郡都有，多少不等，于是就产生了郡望。尤其是那些累世显荣的门阀，总是标榜自己的郡望优越于别郡，他们标举郡望意在显示门第的高下，而门第的高下乃直接关系到家族及每个成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如当时所实行的九品中正制的用人制度，大都是凭藉“世资”和“门第”。因此这些豪门望族对姓谱的记载特别重视，所以我们认为有了郡望也就产生了众多的私家之谱，这两者之间可谓密不可分。东晋偏安以后，许多世家望族纷纷南徙，照样要把自己的郡望带着走，于是在南方就有许多侨置的州郡，至于家谱、族谱自然也都带着走并要妥为保存，因为这是他们行使权利的标志和护身符。而在汉代，还不存在上述的种种社会因素，因此也就不太可能产生私家之谱。

在汉代，见于文献记载的谱牒类文献尚有《邓氏官谱》、《聊氏万姓谱》、王符《潜夫论·志氏姓》、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等。

《邓氏官谱》，《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小叙载录，无作者、卷数，只云“晋乱已亡”。这就使后人有两种理解的空间，一是可理解为邓姓作者所写关于汉代官员方面的书，如南朝梁时谱学家徐勉就著有《百官谱》26卷；二是可理解为邓姓或它姓人所写关于邓氏家族为官的官谱，清代姚振宗即如此认为，其《后汉书艺文志·史类·谱系》考释该书云：

《（后汉）书·邓禹传》：……邓氏自中兴以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按此传云云，似即据《邓氏官谱》。……按范书列传所载如耿氏、窦氏融……诸家与此邓氏禹，并东京世胄，当时皆各有其谱牒，以次注续至晋。宋时范尉宗《列女传·序》称梁氏、李氏‘家传’者，即此类之书<sup>④</sup>，范亦时取参订诸传。<sup>⑤</sup>

姚氏之说自有一定道理，他还认为东汉京城各大世家权贵“当时皆各有其谱牒，以次注续至晋”，范曄撰《后汉书》诸家列传（家传）时还参考了这些谱牒资料。姚氏此说不知何据，似为推断之词。

① 《东方杂志》第26卷第1号。

② 《史通·内篇》卷9《序传》。

③ 《中国家谱学略史》，东方杂志第26卷第1号。

④ “《列女传·序》称梁氏、李氏‘家传’者，即此类之书”，此说不确。《后汉书·列女传·序》文中“梁嫕、李姬各附家传”是说梁嫕、李姬的故事已各附载于《后汉书》其母家的家人列传。

⑤ 《二十五史补编》（二），第2378页。

《聊氏万姓谱》，仅见郑樵《通志·氏族略·氏族序》中有“颖川太守聊氏《万姓谱》”的记载，其他文献则未见著录。《万姓谱》之万字言其多也，并非确指真有万姓。

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和王符《潜夫论·志姓氏》，有的谱学论著认为“皆非谱书之正”，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姓氏之书本为谱学类图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小序开宗明义就是“姓氏之书，其所由来远矣”，可见古人对于谱学之书可统称为“姓氏之书”的，如挚虞的《族姓昭穆记》有谁能说它不是谱牒类文献呢？又如敦煌石室所出《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和《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并序，都仅仅记载每一郡的郡姓，同样都称为“姓望氏族谱”，也从未有人说“皆非谱书之正”。尤其是唐代著名谱学家柳芳在论述历代谱学著作时曾明确指出：“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sup>①</sup>其所谓的“谱学”大都是姓氏类著作。

## 二、司马迁与谱牒学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研究和应用谱牒文献的第一人，也是采用表谱形式记载人类历史的第一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谱牒学家。这是研究汉代谱牒学无法回避却又无人论及的问题。

说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研究和运用谱牒文献的第一人可能不会有什么异议，可说他也是采用表谱形式来记载人类历史的第一人或许有人会提出异议，问题可能在于“表”后的“谱”字，因为当今的谱学研究者始终无人称司马迁为谱牒学家。所以如此，实在是有些人不解表谱相通之意所致。其实在古代，对于以表来记述世系的书均称之为谱，故将以表记述家史的书称之为“家谱”。郑樵《通志·总序》既有云：“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太史公改而为表。”可见“表”、“谱”其意一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称司马迁是位有贡献的谱学家才是无可争议的。

司马迁《史记》中设有10表，史家评之曰：“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紫紵以相属，编字戢耆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

所以为快也。”<sup>②</sup>此表体对谱牒学发展特别是对家谱、族谱的编修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私家之谱已经非常盛行，当时所修之家谱、族谱采用“表”否已不得而知，但欧阳修记其所见族谱说：“唐之遗族，往往有藏其旧谱者，时得见之，而谱皆无图，岂其亡之，抑前世简而未备欤？”<sup>③</sup>其所谓的“图”指的就是表，“皆无图”就是皆无表。由此可知欧阳修所见唐人的族谱都无表的形式。有鉴于此，欧阳修在编纂欧氏族谱时，遂仿太史公《史记》、郑玄《诗谱》略依其上下傍行作为谱图，“如此，则子孙虽多而不乱，世传虽远而无穷，此谱图之法也。”<sup>④</sup>作为历史学家的欧阳修受到《史记·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等启发，在族谱编修中采用了列表的形式来反映家族世系的承传关系，代系关系一目了然。同时的苏洵所修之苏氏族谱，也采用了表的形式，此后遂成为编修家谱的程式。清代章学诚也是一位谱牒学家，他认为表乃是家谱中最为重要的体裁，是家谱的主要组成部分，并指出：“家谱系表，旁行斜上，乃同谱旧式，后史所书者也。”<sup>⑤</sup>他还多次说明，司马迁是将周谱复活的功臣，所以研究谱牒学是不应忽略司马迁这位对谱牒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功的。

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曾利用谱牒资料并以列表的形式记载历史，以弥补因资料不足而无法以文字系统记述的困难。司马迁认为，西周以来尚无一部综合性的历史著作，诸家各记其说，“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字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迄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sup>⑥</sup>他采用列表的形式，逐年载记这些诸侯国所发生的大事，这种方法比较灵活，有事则记，无事则缺，“起自共和，终于孔子。十二诸侯，各编纪年，兴亡继及，盛衰臧否，恶不揜过，善必扬美，绝笔获麟，义取同耻。”<sup>⑦</sup>

至于黄帝以来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资料就更加少，司马迁也根据谱牒等资料作《三代世表》，其序云：

② 刘知己《史通·外篇·杂说上》。

③ 《欧阳修全集》卷74《欧阳氏谱图序》，中华书局2001年。

④ 《欧阳修全集》卷74《欧阳氏谱图序》，中华书局2001年。

⑤ 《章氏遗书》卷13《高邮沈氏家谱叙例》。

⑥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⑦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卷末“索隐述赞”。

① 《新唐书·柳冲传》，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册18，第5680页。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于是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所谓“谱，布也，列其事也”<sup>①</sup>；“牒者，纪世谱之书也。……‘稽诸历谱’谓历代之谱。”<sup>②</sup>此表名曰《三代世表》，实从黄帝以来记起。《史记》中还有《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不知情者很可能认为，汉朝建立以来一定是资料丰富翔实，其实不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云：

汉兴以来，至于太初，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强弱之原云以世。

这说明，汉初的诸侯封、废、分、削频繁，而当时“谱纪不明”，要把诸侯王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确非易事。汉初曾封过7个异姓王，后相继废除，而改封同姓王。“七国之乱”后又采用了一系列分削措施，如将齐分为7、赵分为6、梁分为5、淮南分为3等等。面对如此头绪纷繁的现象，经过司马迁的努力使这些诸侯王的兴废情况，都在此表中得到有序的反映。可见司马迁不仅用表谱形式记载古代的历史承传，而且同样也记载现代历史的发展。

司马迁创立的这种史表，为史书编修增加了一种新的体式，也深得历代史学家好评，其在谱学上的意义也得到后世学者的一定认同。东汉桓谭在《新论·离世》中就认为：“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sup>③</sup>尤其是南朝梁的谱学家王僧孺的评论，更是肯定了司马迁在发扬和承传谱学发展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梁书·刘杳传》载：

王僧孺被敕撰谱，访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周代。”僧孺叹曰：“可谓得所未闻。”

值得注意的是，王僧孺访问刘杳的目的是请教谱学发展过程中的“血脉所因”，而刘杳的回答很明显是将司马迁《三代世表》视作周谱的承传，所以王僧孺有“可谓得所未闻”之叹。二人在对话中肯定了司马迁在谱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在他们看来，司马迁之外无其他人对西周以来的谱牒资料作过如此深入地研究和利用，并且创造出了新的形式，他当是古代谱牒学的唯一传人。对此，汉魏六朝学者已经有

所认同，而唐代著名谱学家柳芳更有深刻论述：

汉兴，司马迁父子乃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数十代。先王之封既绝，后嗣蒙其福，犹为强家。<sup>④</sup>

然而，在当代谱牒学的论著中尚未有称司马迁为谱牒学家者，原因是这些研究者们误将“谱学”局限于家谱、宗谱，其实谱学不等于家谱学，家谱只是谱学的一个分支，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狭义的谱学而已。

### 三、王符《志氏姓》与应劭《姓氏》

关于氏姓，两者古代是有区别的，氏以别贵贱，姓以别婚姻，秦汉以后这种区别已经不存在了，因而汉代学者在谈论氏姓时，已经把它们当作一回事。对此，古代许多学者如郑樵《通志·氏族略》、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都有一定的论述，而东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与应劭《风俗通·姓氏》则是较早的重要著作，对谱牒学特别是对族谱、家谱编纂中的姓氏溯源影响深远。

王符（约和帝、灵帝人）《潜夫论》10卷36篇，《志氏姓》是第35篇约6000字，专讲氏姓的起源发展、谱牒之源流。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这很可能就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谈论氏姓起源的著作，比王符稍晚的应劭《风俗通义》虽也有《姓氏》篇，但《姓氏》篇的文字则早已散佚，因此《志氏姓》就显得尤为可贵。《志氏姓》第一段则讲述古代“赐姓命氏”之原由及几种原则，其原文为：

昔者圣王观象于乾坤，考度于神明，探命历之去就，省群臣之德业，而赐姓命氏，因彰功德。……昔尧赐契姓子，赐弃姓姬，赐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为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后世微末，因是以为姓，则不能改也。故或传本姓，或氏号邑谥，或氏于国，或氏于爵，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事，或氏于居，或氏于志<sup>⑤</sup>。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谓号也；文、武……所谓谥也；齐、鲁……所谓国也；王氏、侯氏……所谓爵也；司马、司徒……所谓官也；伯有、孟孙……所谓字也；巫氏、匠氏……所谓事也；东门、西门……所谓居

① 张守节《史记正义》。

② 司马贞《史记索隐》。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④ 《新唐书·柳冲传》，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册18，第5677页。

⑤ “氏于志”，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佚文作“氏于职”（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27）。

也；三乌、五鹿……所谓志也。凡厥姓氏，皆出属而不可胜纪也。

这段文字对古代姓氏之别并未作任何说明，而在讲尧赐四姓时，契、弃只有姓而无氏，禹、伯夷既赐姓又有氏。何以如此，并无任何说明。实际上王符自己也不清楚，甚至司马迁时也已不甚清楚，《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段话就足以说明：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可见司马迁已是氏姓不分，难怪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感叹曰：“奈何司马子长、刘知几谓周公为姬旦，文王为姬伯乎！三代之时，无此语也。良由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虽子长、知几二良史，犹昧于此！”文中所讲九种得姓之法，每种都举例加以说明。文章第三段则讲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班为十二：姬、酉、祁、己、滕、箴、任、拘、釐、姁、嫫、衣氏也。”至于为什么25人只得12姓，似乎古代文献中均无说明，而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则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可见得姓之数古代说法亦有分歧。其后，文章则对少皞、祝融、帝舜、帝乙等后人衍生出的姓氏进行介绍。从其介绍来看，有些姓氏发展和衍生是相当复杂的。我们不妨举两则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留侯张良，韩公族也，姬姓也。秦始皇灭韩，良弟死，不葬，良散家资千万，为韩报仇，击始皇于博浪沙中，误椎副车，秦索贼急，良乃变姓为张……。凡桓叔之后，有韩氏、言氏、婴氏、祸余氏、公族氏、张氏，此皆韩后，姬姓也。

此处所言之桓叔，即晋穆侯之子，“十世而为韩武侯，五世为韩惠王”，这就是三家分晋而有的韩国，本为“姬姓”，其后又衍生出这么多的姓氏，而“张良”为逃避秦的追捕而改姓张，与原来的张姓并非同源。

又如战国时陈敬仲奔齐称田氏，并演出了“田氏代齐”。其后则以田姓相传，至汉武帝时，丞相田千秋，以年老，武帝乃赐乘小车出入殿中，故时人称为“车丞相”，子孙遂以为氏，这就可以看出，这个家族姓氏，由陈而田，又由田而为车，可见历史上的姓氏，由起源、发展而演变，内容是相当丰富与复杂的。

应劭《风俗通义》原为30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31卷（含《录》1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30卷，至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苏颂所见只有10卷，即今传的10卷本，较

原书已散佚大半，如《姓氏》、《讳篇》、《释忌》等重要内容都已散佚。吴树平先生的《风俗通义校释》书后附有所辑大量佚文，分为27类，其中第27类为《姓氏》，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姓氏》篇的引言（或篇首语），其文曰：

万类之中，唯人为贵，《春秋左氏传》：“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讥卫灭邢，《论语》贬昭公娶于吴，讳同姓也，盖姓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以号，唐、虞、夏、殷也；以谥，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国，曹、鲁、宋、卫也；以官，司马、司徒、司空、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郭、园、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职，三乌、五鹿、青牛、白马也。

这段文字与《潜夫论·志氏姓》卷首主要内容颇为相近，总结出古来取得姓氏的九种主要来源并逐一加以介绍。至于此篇原来的撰写形式如何，已经不得而知，汪受宽先生有云：“《风俗通义·姓氏篇》，收录当时常见的520多个姓氏，其中有130个复姓”。<sup>①</sup>而今辑佚所得约466个姓氏，从所辑佚文还是能看出，作者于每一姓氏都有受氏原由及受氏人姓名、后世传承人的名字，如

卜氏：氏于事者，巫卜、陶、匠是也。春秋鲁有大夫卜，鲁庄公车右卜国。

三乌氏：凡氏于职，三乌，五鹿。有三乌大夫，因氏焉。汉有三乌群，为上郡计。

文氏：周文王支孙，以谥为氏。越大夫文种。姓氏起源非常复杂，非其九类所能包容，对于这些应劭同样都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如：

东关氏：晋有东关嬖立，汉有将军北亭侯东关义。谨按《春秋》：东关，晋之门名，其先晋守关大夫，以地为氏，而义即其后。

还有后来因故改变姓氏的，如：

既氏：吴夫王之后，子孙因避仇改为既氏，汉有安南长史既凉。

京氏：郑武子段封于京，号京城太叔，其后氏焉。汉京房本姓李，字君明，后推律自定为京氏。

可见古来受氏得姓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还会不断改变的，如京房本姓李，却“推律自定为京氏”，至于因避仇而改姓者历史上更是比比皆是。应劭在姓氏介绍

<sup>①</sup>《姓名的奥妙》，三秦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中,对于稀见的姓氏则比较详尽,而对于流行较广的张、王、李、赵等则相对简略一些,对于“钱氏”的介绍似乎就更为简略。

从王符的《志氏姓》到应劭的《姓氏》篇,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姓氏的起源和发展是编修家谱、族谱首先要涉及的问题。因此姓氏的记载和研究当是谱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隋书·经籍志·谱系》小序将谱牒著作称为“氏姓之书”,而那种认为姓氏之书“皆非谱书之正”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 四、结束语

长期以来,谱学研究者大都认为,两汉时期的谱学是很不发达的,理由很简单,此时既无明显的谱牒著作,也无著名的谱牒学家,从表面现象看来,何尝不是如此呢?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看法,就在于这些研究者们有一个共同的误区,即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私家之家谱、族谱才算是谱学著作,而记述家族姓氏起源和发展的论著则被他们定为“非谱书之正”,而记

述帝王世系的那么多的史表,同样也不被他们所承认。这样两汉时期的谱学发展,确实就成了空白区。

我们认为,我国古代凡是以表来表述世系之书均称之为谱,后来用表记述家史之书亦为家谱。上文征引了《通志·总序》中论述,旨在说明表与谱其意一也,而古代之谱牒著作又大多用以记述帝王之世系,只有认识这一点,才会真正理解谱牒的内涵,才会认识到司马迁才是一位杰出的谱牒学家,才会认识到史书中的各类史表,原来都应当是谱牒学著作。再加上王符、应劭等人专门论述姓氏诸论著,两汉时期的谱牒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多彩了。可见有些谱学研究者必须改变观念,否则面对丰富内容的谱牒学论著,却视而不见。谱牒学并不等于家谱学,家谱学仅仅是谱牒学的一个分支而已,这是古代学者早已有了定论了。而作为谱牒学,则又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只有真正懂得这几层的相互关系才有可能搞清谱牒学的来龙去脉,也才不至于讲出与谱学发展历史不相符合的一些结论。

### A Survey of Genealogy in the Han Dynasties

CANG Xiu-liang

(History Department,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310036, China )

**Abstract:**The scholars had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genealogy in the Han Dynasties, because only Family tree and genealogical tree written by private person were regarded as genealogy works by them. But the origin of surname and historical list of emperors also were regarded as genealogy works in this paper. So all kinds of historical list in the historical books just like Shi Ji and surname works written by Wang Fu, Ying Shao constituted the genealogy in the Han Dynasties.

**Key words:** Genealogy; Genealogical tree ;Family tree

(责任编辑:黄云鹤)